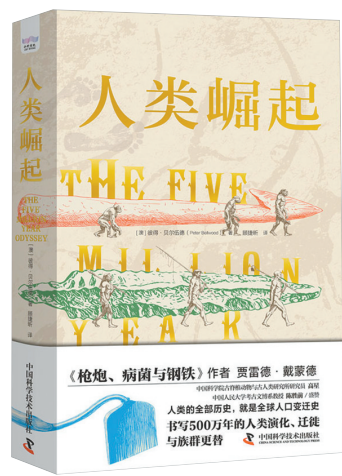


五百万年的奥德赛

——《人类崛起》中译本读后

袁永明



史前考古一直是考古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直接涉及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故而成为考古学研究领域里举足轻重的部分。而且因为超级漫长的人类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录,有很多待解之谜,越容易引发公众的好奇。相应地,探讨、解读史前时代的著作也就不断涌现,其中不乏精品佳作。日前,我饶有兴味地拜读了一本史前史/史前学著作,深感该书正是这样的一部著作。这部书便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于今年九月推出的《人类崛起》中译本。

《人类崛起》一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这位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将此书定位为“面向非专业人士”的“科普历史书”,同时“希望这些内容不仅会激发普通读者的兴趣,而且能得到某些同行认可,尤其是那些在考古学领域之外,利用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获取数据和信息并用于人类历史学研究的专家。”读罢此书,笔者深感作者的上述希冀均已圆满达成。

彼得·贝尔伍德教授的若干著作,此前已译译为中文,如《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First Farmers: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最早的岛民:岛屿东南亚史前史及人类迁徙》(First Islanders: Prehistory and Human Migration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等。《人类崛起》一书的英文本出版于2022年。我所读到的应该是他的著作的最新中译本。

本书除前言之外,共分4幕13章,从距今约600万年前的“人族祖先与黑猩猩亚族祖先的分化”开始,一直讲述到“始于12000年前的中东”的农业、城市及智人的加速扩散。作者拥有开阔的视野,更兼多年的学术积累,故而本书虽定位为“科普历史书”,但完全按照学术专著来呈现。仅举一点,即可见其大端:全书中文版正文约350页,注释及征引文献即有50页之多。本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人类的起源与扩散、环境的变迁、农业的兴起等,而在人类迁移、语言驱动等方面用力尤勤。对于中国史前时期的遗存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既

包括早已大名鼎鼎的北京猿人、蓝田猿人等,也包括近几十年甚至近年来才为人所知的田园洞人、上山遗址等,不仅充分表明中国的相关内容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也体现出作者的学术敏锐性。考虑到本书原本的受众群体主要是英语国家的读者,这样的安排无疑更有助于这些读者对中国史前考古的认知。

此外,作者对于语言在人类社会史中的推动作用也给予了较为细致的揭示。其中,对起源于我国台湾岛的南岛语系族群的诞生、壮大及其向更广阔世界扩散的过程着墨尤多。连同作者对其他语系、语族人群所做的分析,已足够让我们领会到语言的突飞猛进对于人类发展所体现的巨大威力,尽管他只是提纲挈领。窃以为,语言不仅是传情达意、沟通彼此的重要手段,也是披荆斩棘、征服未知的有力武器。它与有形的工具、武器、房屋等,一同构成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和挑战自身极限的不竭动力。总之,本书作者以其数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就人类五百万年的发展史这个宏大主题,精心奉献出这部专著,既具科普图书的可读性,又有研究论著的严谨性。正文之后的注解和引用文献来源也为了有意拓展阅读、展开研究的人士提供了一份可靠的参考。

另外,本书译者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顾捷昕老师也值得称道。她一直坚持以“英文理解,中文演绎”的原则来对待翻译事业。此前已有多部译著问世,颇受好评。对于与其自身专业背景和知识储备反差极大的这部著作,身为资深译者的她遇到不懂的就认真去查,还与作者通过邮件往还,从而排除了疑点,获得了真知。而且她的译笔堪称上乘,忠实、严谨而又流畅、易读,完全没有某些译作所体现的滞涩,更没有莫名其妙的“发明”,很好地践行了翻译界所推崇的“信达雅”。

当然,金无足赤,要说有什么可以改进之处,谨试举如下,以供商榷:

书中个别涉及考古学专业术语的中文译法似可改进。比如,“放射性碳法”一般作“放射性碳素测年法”或“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再有,书中的考古“发掘”一词,用成了“挖掘”。实际上,从考古学

的术语而言,中文语境中早已称为“发掘”而弃用了“挖掘”。关于这一点,著名考古学家陈雁先生曾有过精彩的阐述。(见陈雁:《说文解字:考古发掘与考古挖掘》,《今晚报》2013年3月3日。后收录于其所著《说说考古》一书,故宫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此事虽小,但对于学术而言,不可因其小予以忽略。

本书英文原名为The Five Million Year Odyssey: The Human Journey from Ape to Agriculture。中文版成书则仅用了“人类崛起”四字。简洁则简洁矣,但未免略有遗憾。笔者认为,英文书名的内涵更为丰富,而全书的广阔视野也与之契合。特别是Odyssey一词,直接来源于古希腊著名的两部荷马史诗之一,意在揭示人类发展史堪比奥德修斯战胜特洛伊之后历经艰险重返家乡的壮举,伟大而又神奇。Odyssey固然在西方世界影响更大,但在中文语境中并不陌生。本人在此试译为《人类从猿到农的史诗历程——500万年的奥德赛》,或《500万年的奥德赛史诗:人类从猿人到农业之旅》,聊备一说。

但上述这些顶多是白璧微瑕,只是本人知无不言而已,还望有以教我。

本书第十三章的一段话,或许其意涵有些萧索。不过,我认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本以考古学为底色的著作的认知,因此引用在此作为本文的结束,以求与诸君更多地思考:“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够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帮助我们判定未来,而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共同的人性。一旦对人类共同的人性有了清醒的意识,我们自然就会受益良多。其中有个益处就是,在民族和种族矛盾激化、猜疑和厌憎情绪甚嚣尘上的时候,人类会对这种情况加以控制。”本书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也可以促进我们思考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人类崛起》

作者: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
译者:顾捷昕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他山之石

《牛津欧洲青铜时代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uropean Bronze Age)于2013年由牛津出版社出版,由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哈利·福克森(Harry Fokkens)和安东尼·哈丁(Anthony Harding)主编,旨在全面介绍欧洲青铜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书中汇集了五十多位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了解欧洲青铜时代的权威著作。

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各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有所不同,但多数地区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迈入了这一阶段。青铜时代是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时期,人们逐渐掌握了冶金技术,青铜器得以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牛津欧洲青铜时代手册》以其全面而深入的内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欧洲青铜时代社会和文化的窗口,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牛津欧洲青铜时代手册》整合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学术见解,详细介绍了欧洲青铜时代的社会及年代学研究成果。全书分为专题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两大部分,共计四十八章,涵盖二十八个考古学专题和十九个地区的研究,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欧洲青铜时代画卷。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该书相较于同类著作的创新性、资料来源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并总结了青铜时代研究中的学术争论,包括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差异和全球各地区间的文化联系。传统年代学研究主要依赖于陶器和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但由于各地区情况不一,加上陶器和青铜器的发展往往是平行的,遂导致各地的年代序列缺乏明确的联系。随着碳14测年和树木年轮法等科学方法的广泛应用,解决了部分年代学问题。Needham和他的同事在1997年将C14测年技术引入不列颠地区,他们通过检测竖斫斧为该地区青铜器建立起了年代序列。2006年,Randsborg和Christensen使用树木年轮法对北欧的橡木棺材进行了研究,建立起多个国家的年代序列。但 these 方法有其局限性,需要结合其他方法进一步分析各地区之间的年代关系。

此外,在世界体系研究中,关于青铜时代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一直备受关注。较早时期,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心—边缘”的框架(Rowlands, Larsen, Kristiansen, 1987),认为青铜时代的文化和技术传播是以地中海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然而,这一框架忽视了周边地区文化的主性和多样性,于是之后又形成了一个关注各地区发展的新模型。这一模型关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指出区域系统对当地权利结构有重要影响。在这一模型之下,学者们承认欧洲青铜时代多地区存在大量长距离和短距离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这些交流促进了技术、文化、商品和信息的传播,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该书第二至二十九章是关于欧洲青铜时代年代学和考古专题研究。其中第二章为西欧地区的年代学研究,分为不列颠与爱尔兰、荷兰、法国与比利时、伊比利亚半岛三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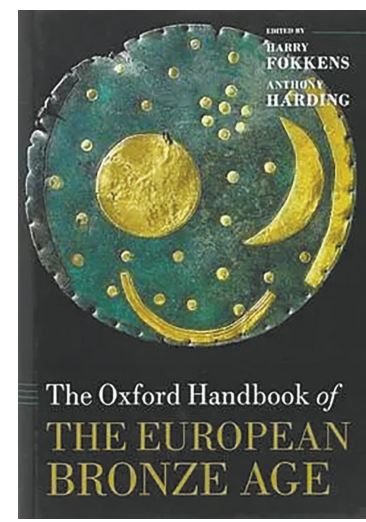
第三、四章聚焦于公元前2500年至前2200年这一关键时期欧洲的意识形态、考古学文化及相关研究。

第五至二十九章按照专题对欧洲青铜时代进行了综合研究,涉及遗址、墓葬、窖藏、纪念性遗址等考古遗迹的详细分析,以及骨骼同位素分析、权利与社会阶级、战争、动物、青铜制品等专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来审视欧洲青铜时代文化面貌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变革性。

第三十至四十八章为欧洲青铜时代的区域性研究,结合考古发现,这些章节将欧洲细分为

欧洲青铜时代研究的大成之作·《牛津欧洲青铜时代手册》评介

周海 毕经纬



不列颠与爱尔兰、低地国家、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巴利阿里群岛、意大利半岛、西西里、撒丁岛、北意大利、波兰、捷克和奥地利、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西巴尔干等多个地区,并对这些地区的年代序列和物质文化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每个地域的研究各有侧重,比如在不列颠与爱尔兰地区,探讨了青铜时代早期的定居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色;在低地国家,研究则聚焦于该地区独特的青铜制品、墓葬和居址。区域研究使我们不仅能够深入了解欧洲青铜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还能够看到这些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从而更全面地认识欧洲青铜时代的整体面貌。

上述研究均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确保了研究的专业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同时,由于每位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和编写的风格不同,导致整体阅读体验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学术研究的复杂性和主观性,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学者自身的学术偏见。

2003、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两周卷相继出版,介绍了中国考古工作者关于青铜时代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中国考古学》两卷与《牛津欧洲青铜时代手册》都以各自地域的青铜时代为研究对象,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两地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技术演进的深刻见解。这两部著作皆有体系完善、资料丰富的特点,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但二者在内容设计和研究方法上仍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内容设计上,《中国考古学》两卷从王朝的角度,详细介绍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墓葬、农业、手工业遗存、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囊括了三代考古学中中原与周边地区最新的考古学材料,其研究的整体性更强,编写体例一致,且关注到各时期各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异同与关联。相较之下,《牛津欧洲青铜时代手册》更加侧重专题和区域研究,比如依次考察了欧洲青铜时代的陆路交通、贸易、动植物、盐业、货币、岩画等多个专题,还对各地区的物质与文化进行了探讨。虽然《牛津欧洲青铜时代手册》研究的整体性较弱,但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维的青铜时代的欧洲。

其次,研究方法上,《中国考古学》两卷注重对考古材料的梳理,通过对遗址和遗物建立时间框架,揭示中国青铜时代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同时,该书也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对重要遗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而《牛津欧洲青铜时代手册》更强调多学科交叉方法的应用,包括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融入,角度比较多元。此外,该书还大量回顾了学术研究的历程,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解释。

总的来看,《牛津欧洲青铜时代手册》是一部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欧洲青铜时代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学者深入了解欧洲青铜时代的物质文化、社会结构、精神信仰和技术状况,在内容设计与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虽然存在整体风格不一以及个别学术偏见等问题,但瑕不掩瑜,值得细细品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19XKJ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uropean Bronze Age》

编著:Harry Fokkens
Anthony Harding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13年8月

“局外人”柴尔德

——《柴尔德的方法 and 理论——史前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阐释》中译本读后

马梦乔

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解读柴尔德”系列丛书共四本,其中《柴尔德的方法 and 理论》(英文原版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V. Gordon Child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Prehisto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0)对柴尔德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经历着墨最少,几近于无,而是完全围绕他的学术研究,李零称其为学术性传记(“代总序”第9页)。但对柴尔德而言,他的史前史研究与当时的政治走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在某些时候甚至直接改变了他的研究基调。作者芭芭拉·麦克奈恩(Barbara McNaim)在书中重点讨论了柴尔德对欧洲和近东史前史所做的综合性工作,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此一阶段,柴尔德研究中的历史和哲学理论背景还不突出,或者说柴尔德还未形成理论自觉。物质遗存之间的相似性,或者说非相似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时空关系本身,就是柴尔德编撰欧洲史前史,但他显然不满足于这样的史前史。在后期,柴尔德的关注点转向社会考古,也更清楚地表达了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过,他从来不认为任何模型可以预测历史,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本书第147页),他也不像某段时期内的苏联学者不加批判地对考古材料进行“原教旨主义”式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对柴尔德研究史前史最大的启发可能是为后者提供了一种经济学的视角。他曾从功能经济学的角度对汤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的“三期说”进行了重新阐释,赋予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概念以经济发展阶段的内涵,将历史发展时间顺序的模型抽象为社会类型—阶段。这是对启蒙时代以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做法的继承,而视特定技术与某一社会和经济形式相对应的主张(第95页),则表明柴尔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

与之前的人相比,柴尔德显得太过“科学”;与之后的人相比,柴尔德又不够“科学”。在牛津,柴尔德接受的是古典学训练,后者的传统是关注成熟的地中海文明中那些高级物质文化以及承载了伟大思想的文本。与之相比,他在苏格兰奥克斯尼群岛发掘的斯卡拉布雷遗址(Skara Brae)就显得相形见绌,这是一个史前小村落,只有几座石屋和石制家具、石和骨制的工具、陶器,唯一珍贵的可能是一些串珠项链。但柴尔德没有低估它的价值,斯卡拉布雷遗址恰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例证,成为他写作《苏格兰人之前的苏格兰》(1946)的绝佳案例。将视线聚焦于“伟大”之外的寻常遗存,关心普通人的生活,是科学地研究整个人类

社会史所必备的素养。此外,柴尔德否认在历史进程之外存在任何现实的来源,也不存在超越现实的永恒法则,历史进程具有自足性(本书第127~128页)。能被历史学家的理性所认识的是趋势,而不是规律(本书第129页)。这是柴尔德对历史的性质和历史学边界的认识。

柴尔德的不科学体现在他提出了很多未经检验的假设,其中多是和传播问题相关的,在绝对测年技术出现之前都无法对其进行验证。欧洲史前文化的年代比柴尔德认为的还要早几个世纪,很多据信属于近东的发明实际上在欧洲出现的时间更早。比如伊比利亚巨石建筑的起源问题,柴尔德倾向于东方起源说,但后来证明他错了。又比如他对特洛伊青铜文化和多瑙河流域文化(Vinča)的判断也被证明是错的。他费尽心力构建的史前欧洲框架被新的测年方法颠覆了,连他自己设想的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以及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发展路径和整体特征的看法,都失去了立论的根基。然而,我想柴尔德如果在有生之年能够见证“放射性碳革命”(the Radiocarbon Revolution),他很可能奉其为第四大革命(其他三大革命是“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知识革命”)。他不厌其烦地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修改即证明了他是一个不惧承认错误的真正学者。然而,他是死得太突然了。

柴尔德时常说些戏谑的俏皮话,或以出格的着装和行为解构刻板传统与教条,但他绝不玩世不恭。哪怕是战争期间,柴尔德也对人类的命运抱持乐观的态度,深深相信“进步”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在他的《人类创造自身》(1936)、《历史上发生过什么》(1942)、《进步与考古》(1944)等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但是对于他个人的命运,柴尔德几乎从来都是悲观的。他曾不止一次表达过自杀的明智性,但没人清楚是什么促使柴尔德付诸行动。可能是对衰老的恐惧,也可能是对自己不再能产出什么创造性贡献的担心,又或者是对于“冷战”中世界前景的深深绝望。哪个才是最后一根稻草已经无从知晓。总之,他还没见到最后一本书《欧洲社会史前史》(1958)的样书,就魂断蓝山了。

柴尔德在爱丁堡大学执教了19年,但从未试图建立一个学派。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前,他销毁了日记和书信,柴尔德生于澳大利亚,远离大陆,也许他命中注定就是一个独行者,一个局外人。

《柴尔德的方法 and 理论——史前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阐释》

作者: [英] 芭芭拉·麦克奈恩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张力生
出版时间: 2024年3月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遗址	博物馆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联系人: 张总 1357270596
座机: 029-88346392
官网: 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